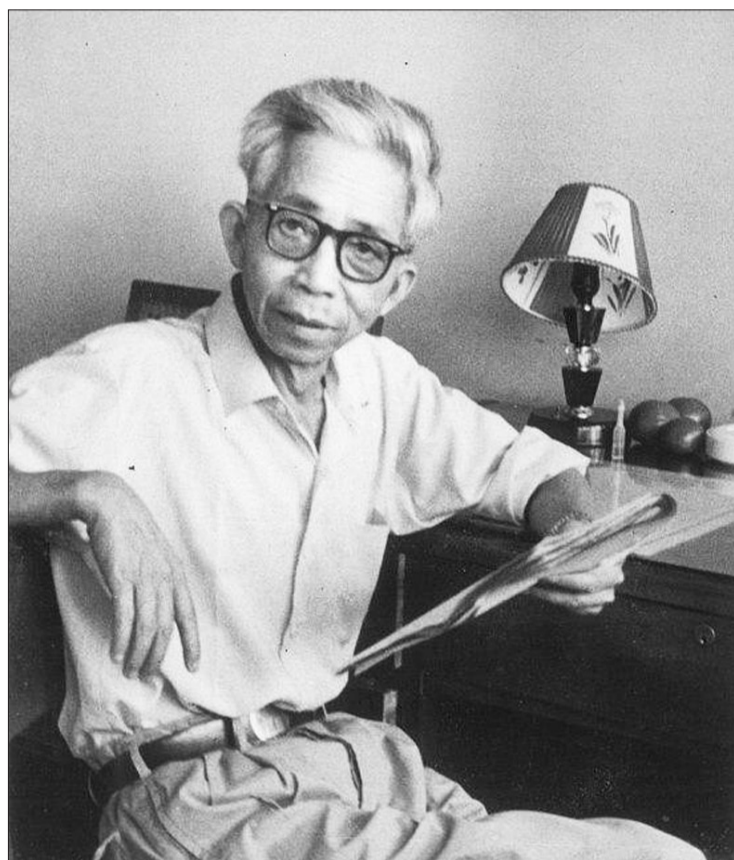


萧殷先生的文字

■韩帮文



萧殷

1

华侨最高学府暨南大学文学院的一楼大厅,有一面墙张贴着90载历程中各个时期俊彦鸿儒的图像,陈钟凡、郑振铎、钱锺书、何炳松、周谷城、沈从文、梁实秋、夏衍等先生都曾在这里留下不凡的足迹。每天,学生从这里走过,历史的光辉洒了下来,好像悄无声息落了一身清雪。

群星闪耀中,有一张黑白图像,那个人面目清瘦,线条硬朗,眼神中透着沉静与坚毅。他是萧殷先生,在上世纪60年代,他曾任中文系主任。

犹记得13年前暨大研究生开学的时候,学科点组织了一次师生见面会,著名学者饶芑子先生给我们上了第一堂课,特别讲到时下年轻学子应该对系史、院史有所了解,记得并懂得这些名教授的治学经验,总是一件好事。就在那里,从饶先生口中得知系史上这位份量很重、地位很高的文艺理论家——萧殷先生。饶先生曾做过他的助教,受他教益颇多,也从他的日常中领会了人格的魅力。饶先生讲起那些朴素细致的往事,让人感动,让人神往。

萧殷先生是谁?了解多了,更知他的了不起。

老先生是老延安,资格很老。1938年他就去了革命圣地延安,进入鲁迅艺术学院(后简称“鲁艺”)学习,并由学员转成为教员——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员和中央党校教员。1942年,他在延安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,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论述了文艺为什么人、普及与提高、内容和形式的统一、歌颂和暴露等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性问题,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生态及创作的影响不言而喻。在一定程度上说,《讲话》的接受史、影响史与阐释史,就是一本鲜活的当代文艺史。

聆听毛泽东讲座的时候,萧殷先生年仅27岁,可以想见,这对他的文艺思想会产生深刻的影响。1949年以后,萧先生像许多鲁艺人一样,成为国家文艺的组织者与管理者,从事文艺创作、文艺评论、报刊编辑等工作。参与编办《文艺报》与《人民文学》这两大权威报刊,即是“不知休息,不逃避任何困难的工作”的明证(《1949—1999·五十年文坛亲历记·萧殷在当年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,第413页)。

萧先生在文艺界资格老,但从不倚老卖老,而是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有才干的年轻人。一连串的单早已映现在大量作家对他的回忆文章之中。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就曾受其关爱,对其以“恩师”相称。1987年6月30日,在他给萧先生的夫人陶萍女士的一封信中,就表达了对恩师的感激与敬仰:

萧殷师一生勤勤恳恳,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,许多年轻人受到他的教益。回想五十年代,我二十岁的时候,他对我的极不成样子的处女作

初稿《青春万岁》的鼓励和指点,回想在赵堂子胡同萧殷师的小院谆谆受教的情景,永生难忘。

萧殷同志是我的恩师。在严峻的日子里,他鼓舞我安慰我;在春回大地的时刻,他热烈地召唤我的“第二次文学青春”。当然,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好处,而是通过这一斑可以看到萧殷师的遗泽与师心。

(《给陶萍同志的信》,《作品》,1987年10月号)

在王蒙先生眼里,萧先生显然是发现其文学才华的“伯乐”,这份情谊让他一直感怀在心。他在《不成样子的怀念》一文中,用饱含感情的笔调,回忆在北京赵堂子胡同6号和恩师萧殷的第一次会面:“在那里,文学的殿堂向我打开了它的第一道门,文学的神物化为一个和颜悦色的小老头,他慈祥地向我笑,向我伸出了温暖的手。”

2018年12月7日,萧殷文学馆在河源图书馆揭幕,84岁的王先生专程赶来参加这一庄重的仪式。王蒙在座谈会上说,他的短篇小说《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》遭到批判时,萧殷曾出面辩护更令他难忘。在王蒙眼里,萧殷一般很少严厉批评别人,“他是一位非常讲品质的人,是一位非常自律、非常崇高的人”。

在这之前,王蒙还来过一次河源,同样是为了缅怀恩师。1986年,他时任文化部部长,到龙川县萧殷公园拜谒恩师雕像。当时全国除了青岛有一座鲁迅公园,其它地方还没有以作家名字命名的公园,龙川的萧殷公园是第二座。

萧殷先生就是龙川人,生于岭南最古老的城镇之一的佗城,原名郑文生,曾用名萧英、肖英。鲁迅先生1936年10月9日就曾在日记中记载:“得肖英信并稿”。

2

从广州赶到佗城,已是大中午。虽已近深冬,但暖阳还是毫不吝啬地洒在南中国的土地上,和煦的风吹来,好像这已到了春天。将车停在孔庙前面的广场上,首先映入眼帘的,是一座电影院,上面写着“佗城电影院”,落款便是“萧殷”。

电影院有些年头了。那种山字形、马头墙式的牌楼,一下子将人拉回到过去的场景之中,仿佛在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游客:来佗城,就是来怀旧的。这样的电影院几十年前在县城或小镇比较常见,但后来在城建的洪流中不断遭受毁灭。一问当地人,佗城的这座果然是上世纪40年代的老电影院。1949年以后,进行过数次翻修,一直延续到现在,被改造成颇有地域特色的饭厅。几年前,当地政府要扩建孔庙前的广场,本来要拆除这座电影院,有领导来视察,一看电影院的名字是萧殷题写的,便要求保留下来。或许,萧殷做梦也不会想到,死后多年,自己的名字还能发挥“免死金牌”的威力,居然保住了一座老电影院。

从老电影院往回折返,沿着商业街走大概10分钟的路,再拐进一

条小巷,就到了萧殷故居。萧先生在自己的文字中称这个地方为“竹园里”,那时周围一片竹林似海,清风如梦。现在来看,环境不免有些杂乱,后建起的房屋参差不齐,高矮不一,密密匝匝地包围着他住过的老房子。这是一座三层的小楼,外表很像开平或东莞的雕楼,只是尺寸小了几号,白色的墙体历经风雨的冲刷,一片片地露着深色的质地,更添了几许沧桑的样子。

我站在路边,凝视着窗户,到底想知道什么呢?是他“灰色的童年”(《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》这篇回忆录第一节即“灰色的童年”)还是贫困悲苦的生活?是他对权贵的愤怒还是对大同社会的期望?是他的勤奋好学还是他的革命理想的萌发?是他对新文学的热爱还是对荷马史诗《奥德赛》的阅读?是他对小人命运运的怜惜,还是对生命和世道的最初思索?

绕过老房子,走到前门,在一楼的门楣上看到萧少其先生题写的“萧殷故居”的牌匾,由于光线幽暗,不仔细看,很容易忽略掉。萧先生是萧先生1930年代初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同学,是一位老革命,也是一位颇有成就的艺术家。想当年,萧先生在哥哥的支持下,在美术学院校勉强勉强读了半年,也厌倦了陈旧的古画临摹的教学方式,便拿起笔写小说,“急不可耐希望采用别的武器去参加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和现实斗争”。萧先生的小说创作数量并不多,却是他文学追求乃至整个血肉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,善于写小人物的悲剧是萧殷1949年前创作的主要基调。然而,正如知名学者程文超所说:“萧殷并不为悲惨而写悲惨,生活经历在萧殷心中置下了双重情结:对美好的憧憬与追求,对邪恶的抨击与控诉”(《谈萧殷的文学创作》,《中山大学学报》

(社会科学版),1994年第3期)。在《乌龟》《疯子》《狗运的一生》《父与女》《除夕之前》等小说中,会轻易读解到他早年在龙川生活的影子。

离开萧殷故居,走在佗城的道路上,夕阳西下,给这座小镇抹上了浓重的色彩。这是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小镇,这是萧殷先生曾经生活的地方,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留着生命挣扎的痕迹。几十年之后,他这样诉说这个小镇,田园牧歌、人文色调与苦难悲情交织在一起:

佗城面临东江,背靠碧山,山清水秀,景色宜人,处处古刹,古色古香,是南越王赵佗称帝的古城。但到我懂事的时候,它和全国农村一样,正面临着农村经济的破产。“农民头上三把刀,地主官僚高利贷”。加上连年遭灾农民纷纷逃荒要饭,美丽的故乡满目疮痍,一片凄凉。

(《我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》,《龙川诗文》,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,第196页)

3

1949年之前,在某种意义上说,萧殷先生是一种“前行者”的角色。从山区龙川到省城广州,到上海滩,再到革命梦想的聚集地延安,青年人萧殷从苦寒的土地走出来,逐渐加入汹涌的革命洪流,生命的激情与文学的才情和风格激荡的时代滚滚向前。

而在1949年之后,他则逐渐和中心、主流拉开一定距离。1960年,他已过不惑之年五载,便从全国文化中心北京回到南方以南的广州工作,曾任暨南大学教授、中南局文艺处处长、《作品》主编、广东文联及作协副主席等职。仅仅用庸常的眼光来看,京穗两地平台大小、机遇

多少之别显而易见,尤其对处于国家文艺管理重要地位之一的中年人萧殷先生来说,告别京城即意味着某些事业前景的牺牲。

对于这一人生空间转换的因由,著名作家肖复兴先生曾这样解释:

这一举动,和当年艾芜相似,艾芜也是在这相近的年月里要求调回四川老家。这里自然有故土难离的乡情,也有远离那时京城文坛是非动荡之地的心理。仅从这一点来看,我就对他充满敬意,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样明不暗,直不辅曲,向往长闲有酒,一溪风月共清明的境界。文坛上,迎风躬逢和追名逐利之徒有的是。

(《佗城遇萧殷》,《人民日报》2011年8月10日第24版)

在以乡思与撤离文坛江湖之外,萧先生还有其他思虑,那便是对时局动态、文艺生态、自我心态保持一种省思与警觉。他撰述了大量针砭文艺流习的评论文章,着力呵护并扶持更具创作可能性与未来性的年轻作家。毋庸讳言,萧殷先生的知识结构与实践实践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,主要是在“无产阶级文艺”这一论域展开,如著名学者温儒敏先生所说“带有特定时代的某些局限”(《萧殷先生三大贡献》,《新文学评论》,2012年第4期),并且,在相对逼仄的话语空间,他对文艺创作与文化生态的反思,只能采取恰当灵活的话语策略进行有限的言说。但这丝毫没有掩饰、削弱萧殷先生评论的锐气与力量,反而这种“有限度的言说”更加凸显了文字与语境之间的张力,显示了他的文字的韧性、眼光的独立以及生命的现实感与责任感。

1949年以后,萧殷先生出版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专著(专辑)有12本之多,所讨论或涉及的论题包括文学与生活、文学的现实性、创作与理论、创作与技巧、实践与独创性等。他思虑的核心,不妨用他一本的名字加以概括,即《论生活、艺术和真实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)。“生活”与“真实”概念都是文艺理论史上的老问题,可以称作包孕丰富、具有重要发端意义的元范畴,在社会主义语境又衍生出更具统摄力、训导力的美学与政治意义,其所指涉的“现实主义”“反映论”“典型”等命题被推为至高无上的审美法则,进而演绎出波澜壮阔的话语交锋、文艺创作的文化图景。在这样的文化与政治格局中,萧殷先生更多的是扮演警觉者与法魅者的角色,殚精竭虑呵护的是艺术的“真实”,是艺术家的创造力与想象力。

他不厌其烦对文艺创作中的概念化、公式化倾向,对文艺家生搬硬套、机械图解政治话语的纷纭现象给予警示与拆解。早在1952年,1956年,他在上海与青年作家谈话时,就曾这样语重心长地表示:

作者没有很好地研究生活,熟悉生活,没有按照生活本身的理

辑去说明生活;而是匆匆忙忙地草率地以“想当然”的态度去对付丰富多彩的生活。结果,不仅生活的真理不能从生活的真实描写中体现出来,反而首先损害了生活的真实。

这些作者虽然在生活当中,在劳动与斗争的漩涡里面,但是由于他们不认真地深入地观察和研究生活,或者不善于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去观察生活,结果,还不能说对生活是熟悉的;特别是从创作的角度来看,就更加不够了。

(《论思想性、真实性及其他——在上海青年宫和青年作家们的谈话》,《论生活、艺术和真实》,第123页)

现在来看,萧殷先生念兹在兹的也许只是文艺创作中的常识性问题,但在庸俗社会学充斥、泛滥于文艺领域的时代,这样的常识恰恰具有思想的力量。

4

萧殷先生的文艺评论既呈现一种广博的气象,又以风格的开放性、与亲和力著称,已经引起专业学者的重视与研究,成果不一而足。饶芑子先生就特别留意到萧先生极具个性的文艺评论风格:

敏锐、针对性强,是萧殷先生评论的一个特色。萧殷先生向来反对无目的的、脱离实际的“学院式”的文艺批评。他常说: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多么深奥或者多么晦涩难懂,而在于它能够解决多少实际问题,对实践有多大的指导意义。不研究实际,从概念到概念,这种理论是没有生命的,是僵死的教条。他的评论文章都是从现实中来,是为了解决现实文艺运动、文艺思潮、文艺创作中的问题而写的。为了及时地发现问题,他很重视对现实的了解、现状的研究,他经常阅读大量的来稿,和许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保持联系,了解他们在文艺道路上遇到的困难,关注文坛上的新人新作,研究一定时期有代表性的作品和评论,观察文艺的走向,掌握作家、评论家在思考、在探索的问题,进行分析归纳,找出其中的矛盾,然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评论。

(《萧殷文艺批评风格论》,《粤海风》,2017年第5期)

萧殷先生的文艺评论讲究的是敞开的视野与鲜活的现实,在宏阔且又狂热的时代中,从前行者到逆行者,他要守护的无非是知识分子的“真实”,是文艺的常识与生命的常道,无非是从乡土中萌生的那种自然而然的激情与奋争。他热衷于发现并扶持新人新作,远不止是一种菩萨心肠,同样是他对未来的无限期许,对心底那份文化理想的守望。

历史终究过去,而文字中的生命却可以是一种永恒。萧殷先生的文字,留存着蹒跚独行的身影,硬朗且温熟。

秋光壮丽:唐先田及其主编的首部《安徽文学史》

■石钟扬

前几天的傍晚收到先田兄寄来的沉甸甸的三册大书,立即在微信上发布“晚间新闻”今日得书:史上第一部《安徽文学史》,赢得众多朋友点赞与喝彩。

作为从安徽走出来的学子,我从事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数十年,对安徽文学也略有所知。然当我捧读起这部文学史时却仍惊讶不已,宛若置身黄山翡翠谷,目不暇接,美不胜收,没想到安徽文学竟如此丰富多彩。

陈独秀曾有言:“文学者国民最高精神之表现也。”由此引申则知文学史是国民之精神的历史灵魂的历史。透过这部《安徽文学史》,我们可以认识安徽的文学形象。皖人自古“敢为天下先”,从先秦的“南音之始”,到建安诗风到汉乐府《孔雀东南飞》到《儒林外史》……在中国文学史的谱牒上有着诸多的第一人、第一次,如那天柱奇峰常在云雾中却有不可掩失之美。透过这部《安徽文学史》更能了解安徽的文学

性格,从老(子)庄(子)到“五四”的陈(独秀)胡(适),皖人总是既理性又激进地挑战着主流文化,让中国文化/文学多元共通、多彩纷呈;如果说老庄在儒道互补的传统文化结构中占据了几乎半壁江山,那么陈胡推行白话文运动改变了中国千年文化传统的历史走向,让古老的中国终于踏上现代化进程,被视为中国文化/文学史上的“哥白尼革命”。

其实中国文学源远流长,而现代意义的文学史却出现甚晚,迄今不过一百年来历史。国人所撰中国文学史不下千部,除少数专家所撰文学史如王国维之《宋元戏曲史》、鲁迅之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堪称经典之外,多数为陈陈相因,千人一面之物。于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“重写文学史”的呼吁。直到1996年前后复旦以“人性的发展”为线索撰《中国文学史》,才一新耳目,从此诸家纷起,迎来了中国文学史之多元写作时代。地域

文学史亦应潮而生,于是也有了第一部《安徽文学史》。作为安徽文学史的开山之作,不仅须“特立独行”,搜集甚勤,取材甚精,断制也甚严谨;更要“体贴入微”:对相关作家作品之艺术作出精准评价。煌煌巨著,其首创之功不可没。

而作为此项工程的主编,不仅要学术勇气,更要有坚实的学术功底。现任两位主编唐先田、陈友冰都是著述等身之大咖。相对而言,唐先生生长于古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研究,唐先生长于现代文学尤其是当代小说之研究。我对两位主编都有过请益,相对而言,与先田先生交流更深。

先田先生与我同乡(而且都是宿松东乡人,东乡乃富饶之地读书人相对多些),他比我几岁是我双重重学长。同为宿松中学、安徽大学校友,他高中毕业时(1963)我才初二,他中文系毕业时(1967)我刚高中毕业,其实我们在校园并无交集。只是在宿松文曲星的传说中

拜读过他的处女作《秋光壮丽》(宿松中文组编《习作》1962年10月创刊号);好像是1969年夏我在修村地球时,才与这位学长首遇于政策兄的陋室。上大学时我则在周末与聪明或长华到唐府去打牙祭兼聆听其高论。

当然我们远非仅为聊友,几十年来先田先生只要有新著都会寄我,我又成为其忠实的读者。先田先生是个多面手,他送我的书中有论文集《寻找生活主旋律》《红豆集》等,有随笔集《随意集》《追求和悟》等,有论文集《文论长短录》等,有人物传记《唐彦周评传》,有《中国散文小说简编》《20世纪末中国文学类及主义思潮》等文学史论(其实他早年还有小说创作《五分与七分》)。而今集中浏览,终对先田先生之学术形象与学术性格有了全新的认知。

他有着创作的实践,故在文学评论中能体验作家创作之甘苦;他直面生活中的非主旋律,故在文

学理论领域寻找文学的主旋律;他对安徽作家多有跟踪考察,尤对鲁彦周、潘军等作家情有独钟(除《鲁彦周评传》外还编有《潘军小说论》);他与安徽几代作家交朋友,尤其与石楠等作家被侵权时他挺身而出,仗义执言;他不仅对安徽文学知根知底(他主编了若干安徽文学之汇集),对中国文学尤其是散文小说也有着宏观的了解,因此能掂量出安徽文学在“大中华文化”的传承关系和邻近的吴楚文学、齐鲁文学的相互影响,探究安徽文学的发生发展及创新规律,并揭示出安徽文学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、作用及对文学的独特贡献。

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。先田先生数十年之努力与积累,告诉我们:世界是给有准备的人预设的。于是他水到渠成地成了首部《安徽文学史》之主编。打造一部超百万字的巨著难免有不完善处,自2013年首版之后他们又经过几年的打磨,到2019年又出了修订本。我相

信他们会再接再厉精益求精,使这部《安徽文学史》不断向莲花峰之高度迈进。

先田先生年过七十,按千年前杜甫的说法为人生七十古来稀,按当今时尚的划分则还在人生的秋季。这让他想起他的处女作《秋光壮丽》:

春天是万物滋生,蓬勃生长的季节;

秋天是果实累累,成熟丰收的季节。秋天自然不像春天,但它却像春天一样使人迷恋,使人神往。秋天是收获秋种的时日,人们将收起丰硕的果实,播下黄金的种子也播下黄金一般信心的希望。

没想到这处女作竟成为其人生之预言。他对此或始料未及,却为我之拙作预设了标题,曰:秋光壮丽再续。

(《安徽文学史(修订版)》(3卷本),唐先田、陈友冰主编,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5月第一版)